

紀念張其昀曉峯兄

新 華 報

四十年不平凡之交

辜鴻銘論人才：「張之洞爲儒臣，曾國藩爲大臣，李鴻章爲功臣。儒臣以保名教爲己任；大臣則知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至於功臣不過是有功之臣而已……儒臣在大臣之上，而功臣則在大臣之下。」

張曉峯兄歷任黨政文教要職，而綜其一生，都從事教育、著述，爲中華文化之薪火相傳而努力，以「保名教」爲己任，實不愧爲一儒臣。

彥棻於抗戰時期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處長任內，認識張曉峯兄，以後或同事於黨務或合作於政壇，已奠立了四十餘年不平凡之交，曉峯兄給我的教益和啓示至多，敬佩良深。

當我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處長時，爲使距重慶較遠的大學青年學子有機會聽到著名學者的專題演講，曾邀請各大學的著名教授到各校主講各項課題。當時曉峯兄擔任國立浙江大學地理學系主任，名聞全國，我乃邀請他到貴州等地講學。

民國三十二年三民主義青年團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我與曉峯兄一同當選爲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幹事。我們兩人的交往就從此開始

日趨密切了。民國三十八年元月廿一日先總統蔣公引退溪口時，彥棻曾奉召前往晉謁，逗留期間，偶晤曉峯兄，親聆其教益，對其深淵的學識及卓越的風格，乃有更深的認識。

稍後，紅禍蔓延至杭州，我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中央黨部已遷至廣州，曉峯兄嫂避難至穗，彥棻即予接待，並電報總裁。旋奉電示，囑請曉峯兄伉儷赴臺北，我乃購備機票代爲安排一切送他們赴臺，由此開始，我與曉峯兄更是患難之交，相知益深。

在黨方面：曉峯兄任中央宣傳部長時，我任中央秘書長；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曉峯兄接我原任秘書長的職務，我則任第三組主任；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我與曉峯兄同爲院務委員，後來，曉峯兄擔任研究院主任，我擔任指導委員及兼任講師。

在政方面，民國四十三年曉峯兄擔任行政院教育部長，我擔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共同爲推展華僑教育作了一次極密切而收效的合作和努力，後來我們兩人也同時離開行政院。其後我雖再度從政，而曉峯兄則致力於文教工作。

以上所說我們會同事於黨務，合作於政壇，回憶前塵，真有一工作配合，精神貫通，聲氣相

投的感覺。

曉峯兄於民國十二年卒業於南京高師後，初入商務印書館從事地理教課書的編輯工作，隨轉任國立中央大學教席，民國廿四年，大學畢業才十二年，即以一僅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而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

他隨後擔任國立浙江大學系主任、院長，因聲譽日隆，而見重於黨國，曾被選爲第二、三、四屆國民參政員及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暨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大陸淪陷，政府遷臺，曉峯兄先後擔任本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中央宣傳部長、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及以學者從政，轉任教育部長，後又奉召擔任國防研究院主任。曉峯兄此時即決心以教育事業來爲國家盡其最大努力，故在國防研究院後期，他便創立中國文化學院，而發展成爲今日規模宏大的中國文化大學。

彥棻有幸，在中國文化學院創辦時，即被邀參加該院董事會，以事忙未就。迨民國六十九年中國文化學院升格爲大學時，我已於六十七年交卸總統府秘書長職務，曉峯兄於我退休的當日下午，親至敝寓，懇切邀請我兼任文化學院三民主

義研究所五權憲法專題講座教授，當時我以私務繁冗，未即應聘，其後一再洽約，至六十九年在曉峯兄力邀之下，以友誼難却，且從事教育工作向具興趣，才勉為其難。前年暑假後我因年事已高，曾一度懇辭教席，未蒙允許，及後曉峯兄之公子鏡湖世兄於去年擔任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我又被邀請任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講座。彥棻終感負擔太重，將聘書璧還並向新任所長唐振楚兄表示，請其另聘高明，接替我的教席，鏡湖世兄知悉，曾於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偕其夫人枉駕舍下懇談，隨將聘書留下，誠意感人。

我當時不便固却，擬於數日後再行退還，並準備到榮民總醫院問候曉峯兄，詎料當天晚上十時左右，突接陳以令同志電話告知，曉峯兄已不幸逝世了。彥棻一面為曉峯兄之逝世哀痛不已，一面深感鏡湖世兄之熱誠，乃不願立即辭卸教席，而祇得再任一年。

我與曉峯兄有一相同之處：兩人同出身於高師，（他畢業於南京高師，我畢業於廣東高師）；同由教育崗位轉任黨、政（他由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轉業，我由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轉業）；也同由黨政崗位轉回教育工作。

立言立德立功並重

曉峯兄確以「保名教」為其畢生的事業，他無論站在那一崗位，都必以立言、立功、立德並重。他擔任中央宣傳部長時創辦「中國新聞出版社」、「中國一周」等書刊，他擔任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時，創立「中華文化出版社」、「文

物供應社」，出版「學術季刊」、「新思潮」及親撰「黨史概要」，及至在創辦中國文化學院時期，更埋頭編印「中文大辭典」、「中華地圖集」、「世界地圖集」、「蘇俄、日本、中華百科全書」及撰述「中國地理學研究」與「中華五千年史」等，其他專著及論文數百種，實難盡述。

曉峯兄畢生最重視兩事：一為著述，一為掄才。他曾自稱：一生治學，不外五事：一曰國魂，即闡揚三民主義之精義，以為立國之本；二曰國史，即探索中國文化之淵源及其對人類社會之貢獻；三曰國土，即研究中華民國在世界政略與戰略中之地位；四曰國力，即衡斷經濟建設對國計民生之關係；五曰國防，即籌劃國防教育，期從文藝復興，而喚起愛國思想與民族正義，進而培育中華民國之新生力量，以完成復國、建國之大業。

曉峯兄這高超之境界，已不止為「知國家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的大臣，無疑是「保名教」的儒臣了。

曉峯兄治學除了重理論也重實踐。他擔任教育部部長時，在臺北市南海路植物園旁建立國立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教育資料館，教育電視臺和廣播電臺，以及恢復中央圖書館，統稱之為南海學園。更值得頌揚的，他一手辦理延長國民教育由六年至九年，並促成國立政治大學、清華、交通、中央各大學，以及私立東吳、輔仁等大學之復校。把我國教育事業推至一新的境界。

「中原不是無麟鳳，只緣皇家結網稀」，在

我認識的朋友中，用人結網最寬、最多的，曉峯兄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人。

曉峯兄在先總裁身邊，如有建言必先談學人學術，從許多紀念曉峯兄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學人不是直接受到曉峯兄提携的，就是間接受到曉峯兄鼓勵的。連國學大師錢賓四先生當年由香港回國擔任日本訪問團團長，也是曉峯兄為提高學人地位而向先總統推薦的。他在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任內，一發現各單位有特別優秀的人才，他就親筆以蠅頭小楷寫信給他們鼓勵，信寫得簡潔有力，充滿熱情，溫暖得使受信人衷心銘感。曉峯兄在文化學院及文化大學時期，他隨時留意公職人員的進退，如國內黨、政機關的首長，以及我駐外的使領人員，一到退休時，曉峯兄常按其人的專長，羅致於校內擔任教席，希望野無遺才。如溫源寧、王之珍、劉毓棠等先生，都是被邀請任教的名教授；他又創設「華崗教授」以禮遇一些學者，如錢賓四、黎東方及已故的吳經熊等先生，就是受他禮遇的名學人。

記得戰後日本首相吉田茂曾經自負地說過：「我對日本的貢獻，就是在任內培養了一百個大臣。」我們似可為曉峯兄這樣說：「曉峯兄對黨的貢獻，就是為黨國培養了無數的幹部。」彥棻今天為紀念及懷念曉峯兄寫此短文，內心至為激動，我與曉峯兄不但數十年交往，且亦數十年鄰居，現在師大路八十六巷，我們兩宅毗鄰連門，可惜今後再不能見到曉峯兄那溫厚沉毅的風采了，但我們可以告慰的，便是他仍將永遠活在國人的心中！